

贵州省地方志参考丛书

6

贵州地方志
論綱

张新民 著

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

贵州地方志论纲

张新民 著

一九八五年七月二日

引 言

我国是世界上文化典籍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地方志是我国特有的极其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1〕在我国众多的文化典籍中，“有通史以会其通，有断代史以析其代，更有方志以别其方，然后上下纵横，始能靡考无遗”。〔2〕地方志是祖国文化典籍的重要组成部分。

贵州同全国一样，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遗留、累积了丰富的文化典籍，也撰述了数量众多的地方志乘，辑存了有关自然和社会的各方面史料。

顾颉刚先生在《中国地方志综录序》中指出：“今之学者，莫不知史书之不足以尽史，故毕力搜求地下遗物、官署档案、私家书牒，以资实证，然而即在史书之中，固有未辟之山林，未发之金锡在，家谱与方志是已”。瞿宣颖则将方志功用归纳为六：“社会制度之委曲隐微不见于正史者，往往于方志中得其梗概，一也；前代人物不能登名于正史者，往往于方志中存其姓氏，二也；遗文佚事散在集部者，赖方志然后能以地为纲有所统摄，三也；方志多详物产税额物价等类事实，可以窥见经济状态之变迁，四也；方志多详建置兴废，可以窥见文化升降之迹，五也；方志多详族姓之分合，门第之隆衰，往往可与其他史事互证，六也”。〔3〕瞿氏所言，虽未涉及自然科技方面的功用，而已足见方志价值之大，用途之广。

在纂修方志的实践中，对方志的起源、方志的性质、方志的功用、方志的体例、方志的内容以及修志态度、修志方法等问题，贵州方志纂修者也作了众多的探讨，虽然还未上升为完整系统的理论，但都是实践中的经验和认识，从不同角度丰富和发展了方志学，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因此，认真对包括方志遗产在内的我省文化典籍进行搜集、鉴别、整理、评论，研究它们在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状况、地位和功用，总结前人的修志经验和教训，发掘前人的方志思想，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对我们了解贵州的历史积累，从而提高民族自信心，发展民族文化，巩固多民族国家的团结，热爱祖国，热爱桑梓，都有积极的作用。

注：〔1〕台湾地理学者陈正祥在《方志的地理学价值》中指出：“方志或称地方志，是中国文化的一项特殊结晶；在别的国家似乎找不到相同的东西。在某些方面，方志虽有点像欧美国家的区域研究(regional Study)；但也并非完全相同。”（见《中国文化地理》第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12月第1版，第23页）

〔2〕李泰桢：《方志学自》第一章，《论方志之功用》，引自张舜徽《文献学论著辑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第1版，第187页

〔3〕瞿宣颖：《方志考稿序》

目 录

引言·····	(1)
贵州地方志概述·····	(3)
一、贵州地方志的起源·····	(3)
二、明代的贵州地方志·····	(7)
三、清代的贵州地方志·····	(13)
四、民国时期的贵州地方志·····	(20)
贵州地方志的流弊与价值·····	(28)
一、贵州地方志的弊病·····	(28)
二、贵州地方志的价值·····	(34)
贵州地方志在方志学上的成就·····	(51)
一、关于方志渊源·····	(51)
二、关于方志性质与功用·····	(63)
三、关于修志态度·····	(72)
四、关于体裁内容·····	(82)
结 语·····	(101)
后 记·····	(104)

【附录】

贵州地方志存佚目录

.....刘仲勉 张新民 卢光勋搜集整理	(107)
说 明.....	(108)
明代现存方志.....	(109)
清代现存方志.....	(111)
民国现存方志.....	(127)
宋、元亡佚方志.....	(141)
明代亡佚方志.....	(142)
清代亡佚方志.....	(149)
民国亡佚方志.....	(158)
书目附录.....	(159)
贵州方志有关专著选目.....	(159)

贵州地方志概述

一、贵州地方志的起源

贵州地方志的源泉，当推东晋常璩所撰《华阳国志》为最早，是书凡十二卷，始于远古，终于晋穆帝永和三年（公元三四七年），“首述巴蜀汉中南中之事，次列公孙述刘二牧蜀二主之兴废及晋太康之混一，以迄李特、雄、寿之僭窃，续之以两汉以来先后贤人梁益宁三州士女总赞，序志终焉”。〔1〕内容繁富，编次有序，自行世以来，久负盛名。崔鸿《十六国春秋》谓：“常璩少好学，著《华阳国志》十篇，序开辟以来迄于李势，皆有条理。”〔2〕唐刘知几称其详审赅博，能“传诸不朽，见美来裔”。〔3〕宋吕大防亦云：“蜀记之可观，未有过此者”。〔4〕其南中部分，涉及今贵州地理沿革、民族风俗，可供考究。其书《史通》、《通典》认为应入地理类，《隋书·经籍志》、《宋史·艺文志》著录于霸史、别史类，新、旧《唐志》归为伪史类，《直斋书录解题》列在杂史类，《四库总目》载入载记类，章学诚则以为“《华阳国志》非一国记载，又非地志图经，入于霸史（伪史）固非，入于地理尤非，乃杂史之流，限于方隅者”，〔5〕故创名类为杂史方记。从体例上看，《华阳国志》熔地理志、编年史、人物传于一炉，已是早期成体方志，对贵州后世地方志书及其他杂史专书的编撰，有很大影响。

隋唐时期，贵州行政区划，屡有变更，“经制”、“羁

糜”，相互推行，时复废弃，但云约束。就全国性的总志言，隋炀帝大业年间，内史侍郎虞世基奉敕撰有《区域图志》一千二百卷〔6〕，“叙山川则卷首有山川图，叙郡国则卷首有郭邑图，其图上有山川城邑”。〔7〕此后，历代续有纂修，然如“乐史《寰宇》、希先《方域》，卷帙浩繁，于黔独略，则典籍难稽也”。〔8〕

隋唐时期的区域性方志，隋大业中，“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9〕唐地图委州府三年一造，图经五年一修，与版籍同上尚书省。〔10〕

宋沿唐制，“凡土地所产，风俗所尚，具古今兴废，州县之籍，遇闰岁造图以进，〔11〕。图经大盛，遍及南北，边远地区，也有修造。特别是宋室南渡以后，南方经济、文化都有发展，地方图经渐向门类整齐、体例完备的正式方志过渡；而贵州土地的垦辟，生产的发展，促进了文化和教育的提高。如播州首领杨选，“为人嗜书而下士，推择知名士为塾师以课子，闻四方贤士，辄不惜金币以迎，岁常千百数”。〔12〕选子轼，“尤留意艺文，蜀士无贤不肖，人人以为亲己，于是受廛宇下者，结辙于道。轼后先为之结庐授田，由此蛮荒子弟，多屈首受书，以攻文艺矣”。〔13〕文化风气的开启，必然影响到方志的编纂。考《宋史·艺文志》载有《思州图经》一卷、《珍州图经》三卷，〔14〕《大明一统志》引有《遵义军图经》。〔15〕这些就是贵州开创性的地方志乘。此外，郑樵《通志·艺文略》有《梓州路图经》六十九卷、《夔州路图经》五十二卷，《蜀中广记·著作记》著录李国纬、刘德礼等撰四种《夔州图经》，《宋史·艺文志》有《南平军图经》一卷，《舆地纪胜》卷一七八引有《黔州图

经》，遵义“于宋在夔、梓、南平属中，为编载所必及，论地图为古”。〔16〕黔州所辖，亦包括贵州北部及东部一部分地区，都是有关贵州的地方志书。

宋代出现的几部贵州开创性地方志书，尚局限于与中原交往较多的部分先进地区，数量少，品种寡，其体例都是“图则作绘之名，经则载言之别”〔17〕，即图文结合的图经类方志。从这些图经辑录的部分佚文看，主要记载民情风俗、地理沿革、山川形胜，门类尚少，内容亦较简略，尚是未定型的地方志。

元兴，以统治漠北诸部落的成法，移治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推行土司制度，授以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蛮夷长官司诸名号，使其世守厥职，服从号令。为了加强统治，了解和掌握各地情况，元世祖统一中国，即号令督促各地修志，并于至元二十三年（公元一二八六年）命秘书监虞应龙纂修《大元一统志》，二十八年（公元一二九三年），成书凡七百五十五卷。成宗大德七年（公元一三〇三年）又命孛兰盼、岳铉再修，成书一千三百卷。全国大规模地修志，必然促进各地修志事业的发展。这一时期，贵州方志成书的有《顺元路安抚司志》、《贵州宣慰司志》、《镇阳风土记》、《黄平府志》诸书。〔18〕不能确定年代，而大致可推定在元末明初编纂者，尚有《贵州志》、《金筑志》、《遵义郡志》、《播州宣慰志》、《永宁州志》等。〔19〕这些方志虽早已散佚殆尽，然从名目看，可知地记图经成份已大削弱，内容体例渐趋完备，反映新型方志在增加，编撰地区在扩大，为明清方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注：〔1〕 李暨：《重刊华阳国志序》

〔2〕 《十六国春秋·蜀录》

〔3〕 《史通》内篇卷十，《杂述》

〔4〕 吕大防：《华阳国志序》

〔5〕 《章氏遗书补遗·史籍考释例》

〔6〕 《隋书》卷七十七《崔暕传》云：“大业五年（609）受诏与诸儒撰《区域图志》二百五十卷，帝不善之。更令虞世基、许善心衍为六百卷。”同书卷三十三《经籍志》“地理类序”云：“《区宇图志》一百二十九卷。”《太平御览》卷六〇二引《大业拾遗记》谓：“大业初，敕内人豆卢威等三十余人，撰《区域图志》五百余卷，又敕虞世基等撰成八百卷，帝仍以部帙太少，重修为一千二百卷。”互有出入，或一千二百卷乃最后写定之数，此从《大业拾遗记》。

〔7〕 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卷六

〔8〕 阎兴邦：康熙《新补贵州通志序》

〔9〕 《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地理类序”

〔10〕 《唐会要》卷五十九“职方员外郎”条云：“建中元年（780）十一月二十九日，请州图每三年一送职方，今改至五年造送，如州县有创造及山河改移，即不在五年之限，后复故。”（中华书局1955年6月排印本，第1032—1033页）

《新唐书》卷四十六《百官志》“兵部尚书”条云：“凡图经非州县增废，五年乃修，岁与版籍偕上。”

〔11〕 《宋史》卷一六三，《职官志》

〔12〕〔13〕 宋濂《杨氏家传》，载《宋学士文集》卷十一，又见《万历武功录》卷五，《播酋杨应龙传》

〔14〕〔15〕 分别参见《贵州地方考稿》（贵州师大历史系1984年3月油印本）第二册第89页、103页，第四册第105页

〔16〕 道光《遵义府志》卷四十八，《旧志叙录》

〔17〕 王应麟：《玉海》卷十四，《祥符图经》条引李宗谔序

〔18〕 分别参见《贵州地方志考稿》第一册，第21页，第四册，第64页、73页

〔19〕 分别参见《贵州地方志考稿》第一册第20页，第四册第69页，第二册第94页、98页、99页，第三册第59页

二、明代的贵州地方志

明代建立贵州行省，是贵州历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一载：“洪武十五年正月丁亥，置贵州都指挥司，令平凉侯费聚、汝南侯梅思祖署都司事。”永乐十一年二月，“思南、思州相仇杀，始命（顾）成以兵五万执之送京师。乃分其地为八府四州，设贵州布政使司，而以长官司七十五分隶焉，属户部。置贵州都指挥使，领十八卫而以长官司七隶焉，属兵部。府以下参用土官，其土官之朝贡符信属礼部，承袭属吏部，领兵者属兵部。”〔1〕永乐十五年三月，又设贵州等处提刑按察司。〔2〕贵州自此三司并立，结束了分隶于云南、四川、湖广三行省的分散状况，成

为直隶于中央政权的全国十三布政使司之一。

贵州行省的建立，对加强贵州与封建中央王朝的联系，促进贵州经济文化的发展，推动少数民族与汉族间的交往，起了积极的作用。修志方面，明朝因纂修全国大一统志，颁发修志条例，“分遣礼部职员，编行诸司，搜访寰宇文献，缮写进呈，爰备述作”。〔3〕贵州作为一个独立的行省，迫于功令，自得依例行事，敦促各府县，“采辑山川风物，列款奏报”，〔4〕以备纂修省志，上呈礼部参考，故终明一代。修志之风寢盛。如《思州府旧志》即贵州置思南府建省后，首任知府崔彦俊于永乐十五年“奉命采辑录成，差老人谭祖庆进呈”〔5〕者。呈辞曰：

臣奉布政司，付蒙行在礼部贡字二百号勘合，差主事林得等到司转往所属，委文理官员及教官儒士，采取古今事迹，并新旧书回京。臣彦俊查旧无志书，与教官何辑照依凡例，采纂造册完备，具奏。〔6〕

由此可见，自上而下，督促甚紧。各地编造志书，体例一准朝廷颁降修志条例。永乐十六年，沈勖修《普安州志》，即因“累檄切督，固辞弗可，于是旁搜幽讨，溯流寻源，或稽证于他编，或索遗于重纂”，〔7〕始纂定成书的，其体例亦“悉依颁降条例书之”。〔8〕永乐以后，正统、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历朝续有纂作，至万历达于高潮；天启、崇祯两朝，值明末社会动荡，边事扰乱，然仍有续作不辍者。终明一代，仅省志设局官修者，即有四部。其余各地纂修的府州县志，达六十余部。贵州布政司所领府县，大部分都纂修了志乘，其中铜仁、石阡、思州三府先后两纂，镇远、思南两府先后三纂，黎平府、普安州、普定卫竟前后四

次修造。

随着明代贵州社会经济的发展，汉族大量移入，一些著名人物如王阳明、邹元标的谪贬贵州，昔人不经意的蛮荒边徼引起有识者的重视。杨慎（升庵）在嘉靖《贵州通志序》中说：

贵州为邦，在古为荒服，入明代始建官立学，驱鳞介而衣裳之，伐芳藪而郡县之，铲寨落而卫守之。百七十年来，駸駸乎济美华风！而嘉靖中又特开科增额，人士争自磨砺，以笃祐文化，翼赞皇猷，与为多焉……今之议论，以边徼为遥远，不之重，而官斯土者，亦自厌薄之。呜呼！边可轻乎哉？衣之裔曰边，器之美曰边，而器破必自美始，衣破必自裔始，何以异此？边可轻乎哉！

杨氏这段话，屡被后世修志者转相引述，反映巩固疆域，研究边疆史地越来越为人们关注。贬谪或宦游贵州的文人，或题咏山水，或发为专文，撰成专著。如明天台王世性，游踪颇阔，凡“足版所到，奚囊所余，星野山川之较，昆虫草木之微，皇宸国策，里语方言之详”，〔9〕多笔札为文。其《广志绎》一书，“搜考遗佚、风会、物产，一一详核”，〔10〕其中卷五《西南诸省》部分，即据身所见闻，实地考察而成。后人摘出贵州一篇，录为《黔志》一卷〔11〕，足资考证。贵州巡抚郭子章，于平播戎马倥偬之际，辑《黔记》六十卷，“雅有法度，为世所称”。〔12〕此外，亦有本地人潜心究学，发奋搜讨乡帮文献，辛苦历年，独力任之而终有成者，如黄运昌、谭瑞均分别撰有《黔记》，惜未流传。〔13〕

明代的贵州志乘，大部湮没难寻。从现存的四部省志和两部府州志看，弘治《贵州图经新志》以府、州、卫领事

实、人文，虽以“图经”名目，尚有“摘比分标，不相联合”，〔14〕简略粗疏，体例失当等缺点，然合一方天文、地理、历史、人物、文献于一书，已粗具省志规模。嘉靖《贵州通志》是第一部以“通志”题名的省志，分类以事为编，纲举目张，凡建置沿革、郡名、星野、疆域、山川、风俗、土产、土田、户口、财赋、徭役、城池、关隘、桥渡、兵防、职官、公署、宦绩、学校、科目、岁贡、祠祀、寺观、宫室、坊市、惠政、古迹、丘墓、名宦、人物、贞节、孝义、仙释、隐逸、迁谪、流寓、兵变、经略、艺文，无所不载，门类繁多，较弘治《志》详赡，而体例大备。惟“以孝义隐逸别于人物之外，而如陆京、张伯安诸人，又以孝友入于人物”，〔15〕甚为失当。反映贵州方志的编纂，在明代前期尚未完全成熟。

万历时，方志纂修达到高潮并趋于成熟而基本定型。万历《贵州通志》兼取弘治、嘉靖两志之长，或以府州卫所分类为编，或总述兼制经略以相联合，全书为图十有二，附目十有八，曰星野、曰沿革、曰形胜、曰民政、曰军政、曰学校、曰城郭、曰公署、曰秩官、曰名宦、曰经籍、曰艺文。

“丰约同异，草创润色，裁正铨次，咸得其人，卓乎贵之宪章矣”。〔16〕郭子章《黔记》首为大事纪，次有星野、舆图、山水、灾祥、群祀、征榷、艺文、职官、贡赋、兵戎、邮传、公署诸志。复列有总督抚按蕃臬、守令、文武科第、勋恩诸表，再继以帝王世纪及宦贤、迁客、乡贤、忠臣、孝子、栖逸、淑媛、方外、宣慰、土司、土官、诸夷等传，是一部纪传表志诸体俱全，一如正史的方志。其中《大事纪》为前志所无，而此志首创，述事略远详近，简洁而有史法，时人称

之：“黔之故实，厘然指掌，虽黔人不稔也”。〔17〕后此贵州修志者，多遵沿不改。传申事纪所未究，详于人物史事，“虽名公巨卿，亦只载黔事，不及其他”，〔18〕矜慎而得史法。反映明代中叶，贵州志书已由宋元图经过渡为体例完备的正式方志。

明代府厅州县志，现存的仅嘉靖《思南府志》、《普安州志》、万历《铜仁府志》三部。万历《铜仁府志》藏台湾中央图书馆、日本东洋文库，笔者尚未经眼。《思南府志》八卷，以地理、建置、田赋、祠祀、人物、拾遗、诰敕八志为纲，“色色具备，井井有条”。〔19〕《普安州志》十卷，分舆地、食货、学校、兵卫、祠祀、官师、选举、人物、艺文、杂志十门，名目略有不同，而门类稍多于前者。两志虽尚简略，然明物、记人、载事，诸体具备，条贯整齐，已是早期定型方志。佚亡而可考者，如张守让万历《镇远府志》，
“首舆地而次营建，列食货而继学校，载官师而人物、节孝、文艺、吏治、户口、选举、灾祥、风俗，以次胪列，若指诸掌，事核文实，例严载当，称信史关”。〔20〕袁表万历《黎平府志》分舆地、建置、官师、徵输、秩祀、文献、边圉八志，又述厥故事，附以论著，凡九卷三十三篇。〔21〕与嘉靖两志相较，门目略有增损，内容似更完备，反映明代中叶，贵州府州县志也基本定型，并为清代修志的空前兴盛，准备了条件。

注〔1〕：《明史》卷三一六，《土司传》

〔2〕 见《明太宗实录》卷一〇五

〔3〕 沈勳：永乐《普安州志序》，原书已佚，《序》载

嘉靖《普安州志》卷首

〔4〕 蔡懋昭：万历《思州归志序》，原书已佚，《序》载曹申吉康熙《贵州通志》卷三十二，《艺文志》

〔5〕 郭子章：万历《黔记》卷十四，《艺文志》

〔6〕 郭子章：《黔记》卷四十，《崔彦俊传》

〔7〕 沈勛：永乐《普安州志序》，见嘉靖《普安州志》

卷首

〔8〕 同上

〔9〕 王世性：《广志绎》自序

〔10〕 曹溶：《广志绎序》

〔11〕 《学海类编》本、《黔南丛书》本

〔12〕 道光《贵阳府志》卷五十，《艺文略》

〔13〕 参见拙作《明代私撰六种贵州省志考评》，载《文献》1985年第4期

〔14〕 《文史通义》内篇四，《释通》

〔15〕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七十四，《史部地理类存目》

〔16〕 邹元标：万历《贵州通志序》

〔17〕 丘禾实：万历《黔记序》

〔18〕 万历《黔记》卷三十，《江东之传》后附“蟪衣生（子章号）曰”

〔19〕 张烈：嘉靖《思南府志后序》

〔20〕 何天麟：万历《镇远府志跋》，载卫既齐康熙《贵州通志》卷三十四，《艺文志》

〔21〕 此据袁表万历《黎平府志序》，参见《贵州地方志考稿》第四册，第88—90页

三、清代的贵州地方志

清代是方志纂修的鼎盛时期。就贵州说，疆域基本确定，“改土归流”大体完成，地方相对安定，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方志的纂修，自然普遍起来。诚如贺锡藩所云：“风会既开，宜有纪焉！”〔1〕

清王朝入关稳定后，须了解地方情况，以决策施政，巩固统治。康熙十一年即诏令纂修通志，绘制地图。二十二年，又“命省郡各绘图以进，且悉其境内之名山大川焉”。〔2〕于是“抚宪檄下所属有司，采集编纂，将以汇成全志，上达御览”。〔3〕及西陲底定，再次“命臣工重修一统志，曾奉部牒咨查各省部邑志书，采风型俗，教典明礼，备一代之掌故也”。〔4〕台省大臣复“转檄郡邑，新旧志悉充采录”。〔5〕贵州各地修志，同于内地，奉为故事，蔚成风气。有些地方官吏，把修志看成是任内职责，有的官吏纵然学识低劣，也要附庸风雅，招聘博学能文之士，启馆纂辑，于是官修私撰，种类众多，数量丰厚，超过前代，

清代官修地方通志，前后凡三纂。康熙十一年，清王朝颁发贾汉复纂《河南通志》为天下式，〔6〕诏各省督抚聘集儒贤，纂辑通志，备一统志采择。各“直省通志无不毕修，用资簪笔之旁罗”。〔7〕贵州巡抚曹申吉“奉檄开局，广延耆彦，采辑旧闻，旁搜遗失，凡六阅月”，〔8〕得书三十三卷，为清代第一部贵州省志。体例悉仿《河南通志》，强立篇目，多寡不一，失之简略，且由于主修者曹申吉入于清史逆